

中国古代

白话商贾小说

精选
上

邱绍雄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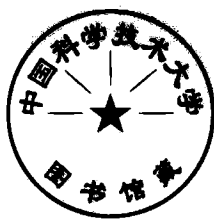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白话商贾小说精选

(上)

邱绍雄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白话商贾小说精选上、下/邱绍雄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8

ISBN 7—218—03000—9

I. 中… II. 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责任编辑	孙泽军 周晓江
封面设计	张永齐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34
插 页	2
字 数	720,000字
版 次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书 号	ISBN 7—218—03000—9/I·414
定 价	5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084. (020)83790667

儒商互补 理欲并重

——试论中国商贾小说的特色和价值

邱绍雄

—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经济和文化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条具有原则意义的价值取向，“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一条根本性的经济政策。文化精神和经济政策在“轻利”、“抑商”这一点上发生偕振共鸣，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得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显得特别艰难，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严重缺陷。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人们常说“儒道互补”，也就是说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各有特色，可以互相补充。但是在义利理欲观上，儒道是不能互补的。不仅儒道不能互补，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释、道三家都不能互补，因为儒、释、道三家在义利理欲观上是完全一致的：儒家从“重义”出发宣扬“轻利”，而道家的体道寡欲，佛家的无欲、去欲，以欲念为万恶之源，则恰好与儒家的观点如出一辙。这种倾向明显而又惊人一致的义利理欲观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大弊端，即要求人们不要追求物质财富，因而也就不要创造，不要进取，而只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和体现先贤圣哲们创造出来的理和义就可以了。它导致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学说的早

熟和昌盛，也使得自然科学、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商贾文化在义利理欲观上大胆地与儒、释、道三家唱对台戏，它宣扬在“好义”之外，“好财”也是一个人正当合理的要求。因此要说互补，在义利理欲观上不是儒道互补，而是儒商互补，才能义利理欲并重。商贾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补充，可以修正传统中国人偏执义理一端的人格缺陷，可以帮助传统中国人走向现代化。

儒商互补，才能理欲并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这一背景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商贾文化研究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所具有的特殊文化价值。

二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都重视对人心、人性的研究，因此理欲关系问题是中外文化关注的共同焦点。大家知道，人是生而有欲的，但同时人又不是单个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他必须遵循一定的人伦秩序，也就是说要尊崇一定的“理”。因此可以说理和欲结合起来才是人性的全部。如何处理理和欲的关系是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尊理窒欲，虽然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人伦秩序，但它忽略了道德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活，否定了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这种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活力，无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轻理纵欲，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变成欲望的奴隶，常常会无所顾忌地采取种种违背人类正义的方式来满足一己之私欲，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极大，同样也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对理欲关系的处理与一个人的“活法”紧密相联，而人的“活法”既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也关系到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所以，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特别重视理欲问题。

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重视理欲问题呢？因为如何处理理欲关系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说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从当今世界形势的发展来看，我们中华民族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面对着生存挑战。一方面我们必须发展经济，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不断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维护合理的社会道德和秩序。双重的任务要求现代中国人既讲利欲，又讲义理，偏执任何一端，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平衡，失去活力；偏执任何一端，中国人也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我们在理欲问题上倡导“理欲并重”，既要考虑到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又要顾及到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以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要做到理欲并重，需要儒商互补。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我国的文化重心正在或将要发生一定的变化，其标志便是原来不被我们祖先所重视的商贾文化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将显得日益重要、不可缺少，因此目前加强对有中国特色的商贾文化的研究具有日趋明显的现实意义。

三

中国商贾小说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又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时代精神。一方面，这些作品反映的是商人的生活，因而它不得不带上商人生活的特色，打上商人社会生活及其思想意识的印记；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反映商人生活，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人生活的渗透。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商贾小说思想上的基本特色。

中国商贾小说的特色和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在文化上所具有的

新意。从其所反映的商贾生活出发，中国商贾小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具有商贾生活特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弘扬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思想，具有许多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精神，择其要者而言：

(1) 在择业观、人生价值观上突破了传统的“读书做官”的人生模式和“重官轻商”观念，视经商为“本等”，表现出一种崇商敬业精神。苏州王生和他的婶母杨氏身上最为耀眼的便是这一点。^① 杨氏对刚满十八岁的侄儿说：“你如今年纪长大，岂可坐吃山空？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营运，待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对此，王生欣然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他们认为经商是自己应该干也乐意干的善业，突破了传统的“贱商”观念，也突破了传统的“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模式，表明商人们的价值观从“官本位”转移到“金钱本位”，抛弃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② 的传统训诫。

(2) 与传统的“舍生取义”、“好义”不同，商人们没有沉溺于“义”、“德”这种单一的道德追求之中，而是认为“好义”之外，“好财”也是一个人正当合理的要求。要敢于发财，同时也要靠正当经营发财，商人程宰的生活表现了这样一种理想。^③ 徽商程宰经商亏本，无颜回乡，只得寄居他乡帮人生理。一日神女降临，在他面前变出许多金银财宝，“从地上直堆至屋梁边”，“程宰是个做商人的，见了偌多金银，怎不动火，心热口馋，支手舞脚，却待要取”。神女见状，用筷子夹起一块肉，伸到程宰脸边，问他：“此肉粘得在你面上么？”程宰道：“此是他肉，怎

① 见《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入话”。

② 见宋真宗《劝学诗》。

③ 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么粘得在吾面上？”美人指金银道：“此亦是他物，岂可取为己有？……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吾当指点路径，暗暗助你，这便使得。”在神女的训导下，程宰放弃了不劳而获、把他物据为己有的非分之想，又在神女的指点下，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贩药材，贩彩锻，贩布，“四五年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小说总结程宰成功的经验为：“人弃我堪取，奇赢自可居，虽然神暗助，不得浪贪图。”它宣扬的是一种对待财富比较合理的态度。因为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都不想发财，也不敢发财，这种观念势必妨碍人的才能的施展、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种观念束缚了人，实际上就是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成员都想发财、敢发财，但又不想靠自己的劳动、采取正当的手段来发财，而是只想把别人的肉割下来粘在自己脸上，把“他物”据为己有，这种对待财富的态度违背人类正义，滋生大量腐败丑恶现象，极大地挫伤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同样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乎此，我们就会发现程宰这个商人形象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它把汉儒董仲舒的训诫“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写成“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在要不要发财和如何发财这两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原则精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3) 商人们在经商中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坚毅性格和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与传统文化要求人们知足、保守的训诫大相径庭。大胆地追求金钱，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商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他们千里经商，奔走四方，敢冒风险。上文提到过的苏州王生刚开始学做生意，三次出远门贩货，三次被劫，婶母杨氏不断地鼓励他：“我的儿，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而且一次又一次地为遭劫的侄儿筹措商银，直到侄儿把生意做成功。做“泛海”生意的张大等人，到海外经商，更是历尽风险：“元来这

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① 大胆地追求金钱，并且敢于为此冒风险，这种闯劲、这种冒险精神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人们各安其位、谨小慎微的保守性格无疑是一个猛烈的冲击。

(4) 突破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既重义，又求利，认为义利可以兼得。儒家文化倡导“重义轻利”，这种义利观的理论前提是道德理性同感性欲望的对立，着眼点是用理性去克制、压制欲望，把义和利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一个人讲义就不能讲利，就不能讲个人的欲望和利益。很明显，这种义利观有绝对化和片面性之弊。商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对这种传统观念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文若虚本是一个破产商人，他随出海商船到海外观光，归途中，他从一个荒岛上拖来准备当床用的大龟壳，竟是稀世珍宝——鼉龙壳，被识货的波斯商人用五万两银子买走。别的商人事后知道鼉龙壳价值连城，意犹不足，对文若虚说：“只是便宜了这回回，文先生还该起个风，要他些不敷才是。”文若虚回答说：“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众人听后都道：“文先生说的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② 文若虚是一个讲义而又得到了大宗财富的商人。忠厚的商人发了大财，这个故事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商人生活的交融。文若虚身上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但他至少在表现“义”和“利”不矛盾这一点上突破了传统：富商也可以是不奸诈的人。

(5) 传统文化从“贫生德，富败德”、贫比富好的贫富观出

① 《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② 《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发，把富和德对立起来，认定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而中国商贾小说表现出一种新的观念：富有不是一种罪过，富和德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和谐地统一起来。《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入话”中的那位徽商，出资救助因欠官银而要投水自尽的贫妇，当晚这位贫妇来旅店敲徽商的门说：“我是前日投水的妇人，因蒙恩人大德，救了吾夫出狱，故此特来踵门叩谢。”“看官，你道徽商此时若是个不老成的，听见一个妇女黑夜寻他，又是施恩过来的，一时动了不良之心，未免说句把倖倖倖的话，开出门来撞见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场没趣，把起初做好事的念头多弄脏了？不想这个朝奉煞是正经，听得妇人说话，便厉声道：‘此我独卧之所，岂汝妇女家所当来？况昏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但请回步，不必谢了’。”他可以说是商人中富而有德的典型。

(6) 在利与情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念认为情和利如水火不相容，因此对商人有一种偏见，认为商人经商求利，根本不懂感情，也不重感情，“商人重利轻别离”^①，白居易的诗句似乎是千古定论，而小商人秦重用自己的真诚和痴情打破了这种偏见。名满京师的花魁女对这位小商贩由最初的不屑一顾到最后主动地发出“我要嫁你”^②的誓言，这个感动“上帝”的奇迹是秦重用真情创造的，他是一个“志诚君子”，一个懂得感情、重感情的生意人。

(7) 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商人生活对它的冲击不表现为打破和否定等级观念，而是表现在等级观念的变化上，即以不同于传统的标准来定尊卑等级。传统社会大多以辈分、官职的高低来定尊卑，而在商人圈子里则以财产的多寡来定尊卑。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那位波斯商人摆酒席招待

① 见白居易的《琵琶行》。

② 见《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

出海归来的客商，排座次的规矩就很特别：“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首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这种“规矩”是新的，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心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金钱作为人格的等价物的魔力，显示出金钱力量对传统尊卑等级观念的冲击，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

(8) 传统文化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万恶淫为首”是传统社会最通行的道德标准，而商人蒋兴哥对自己那位受诱骗失节的妻子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反映了封建贞操观念在商人阶层中的淡化，这种淡化是以对“人”的尊重为基础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商人蒋兴哥长年出外经商，一日突然得知妻子王三巧在家与人有奸，他痛苦：“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可贵的是他在这种痛苦中出于对妻子的尊重，反省到了自己的责任：“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回家后休妻，但又不忍“明言”，以保全妻子的面子。到王三巧改嫁之夜：“兴哥顾了人夫，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匙钥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赔嫁。”后来兴哥在广东合浦贩珠，牵扯到一件人命官司中，王三巧知道后，求自己的后夫——吴知县为兴哥辨冤，使兴哥摆脱了一场大干系，此时两人相见：“他两个也不行礼，也不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结果王三巧又回到蒋兴哥身边来了。这对夫妻离合的故事，特别是蒋兴哥对待王三巧的态度，改造了传统的贞节观念，把对人（包括人的欲望）的尊重和理解与传统的贞节观念结合起来，推动着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演进之迹十分明显。

(9) 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倡协同，贵和持中，因此传统中

国人向来缺少竞争意识，以牺牲效率和进步为代价，追求静态的平衡与和谐；而商人经商求利，参与市场竞争，弘扬一种平等竞争的新观念。《续在原 男分娩恶骗收生妇 鬼产儿幼继本家宗》中的岑家“积祖开个绒褐毡货店，生理甚是茂盛”。主持岑家生意的岑鳞不久就在生意上遇到了侄儿岑金的竞争。岑金不满足于在伯父店里帮工、拿些束修过活，他要自立门户，开创自己的事业。他大大方方地对伯父说：“意欲求伯父划些本钱与我，自去营运。”他的新店开起来之后，与伯父的老店竞争生意，受到伯父的指责，他理直气壮地说：“这行业原是祖上所传，长房次房大家可做，非比袭职指挥，只有长房做得。常言道：露天买卖诸人做，如何责备得我？若说我新店里会招揽客商，他老店里也须会圈留主顾，为何不圈留住了？”市场无情，优胜劣汰，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竞争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10) 传统文化要求人们为人处世讲究温良恭俭让，万事忍让为高，逆来顺受，在个人权益上做个顺民和麻木人；商人们却坚持一种新的道德观念：通过经商获利致富是正当的，人不应该贪图不义之财，但对自己的劳动所得应该珍惜和保护，不容他人随意侵占掠夺。《贪牙脱蜡还旧债》中的贩蜡商人张霸来到福建贩蜡，牙家欺他人地生疏，骗他的蜡去还自己的旧债。精明的张霸很快察知内情，他既没有忍让，也没有胆怯，更不是束手无策。他逼牙家：“你将还人的，及各店买去的，都登上账，只说他揭借去，俱未还银，我将账去告取，你硬作证，怕他各店不再还我！”打官司获胜，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保住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产。

(11) 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也是一种倡导依附的文化，臣子依附于帝王，百姓依附于官吏，女人依附于男人，晚辈依附于长辈，这使得传统中国人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习惯于过一种依附于人的生活，而商人们背井离乡，闯荡江湖，无所依傍，这

种生活培养了商人的自主自立的品格。《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就是一个独立自主意识很强的女商人。她父亲黄公“以贩钱香为业，兼带卖些杂货，惯走江北一带地方”。她母亲在善聪很小时就去世了，唯一的一个姐姐也出嫁了。黄公无奈，只得将善聪女扮男装，带在外地做生意。几年后，黄公客死他乡。善聪孤身一个女孩子在客地他乡遭此变故，她没有惊慌，也没有去哀求别人，而是独自一人操办父亲的丧事。此后，她没有回老家投靠出嫁了的姐姐，而是继续女扮男装，继承亡父的生意，自己养活自己。她选择一个可靠的生意伙伴，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黄善聪假称张胜，在庐州府做生理，初到时止十二岁。光阴似箭，不觉一住九年，如今二十岁了。这几年勤苦营运，手中颇颇活动，比前不同。”黄善聪可以说是商界的女中豪杰，最可贵的是她那种不依附于人，独立自主的精神，这是传统中国人最缺乏的一种品格。

(12)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人们的视野，传统中国人习惯于“吹糠见米”，因此缺乏办大事不计小得失、欲取先予的气度；商人们角逐于商场，深谙“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对经营风险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才有可能驾驭市场的道理，做生意时舍得吃小亏，敢于冒大险，与传统中国人鼠目寸光，斤斤计较眼前小得失形成鲜明对照。《乖二官骗落美人局》中的二娘帮助开店的丈夫招待合伙做生意的朋友，丈夫“算小”，要等对方拿来合伙的银两后再去置办酒席，而二娘办事却显得很有气派，家中无钱，她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当钱，置办丰盛的酒席，并告诉丈夫“宁可丰富些，这是小事”，不要因为舍不得一桌酒席钱而影响生意合伙大事，因为她知道“算小”的人往往会因小失大，结果是得不偿失。

中国商贾小说的特色和价值其次表现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扬上。大家知道，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

化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同时它与商贾生活有一定的相容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有生命力的精华对商贾生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成为中国古代商人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商贾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扬主要表现在它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几位“楷模式”的商人形象，表现了一些来源于中华传统美德又与商贾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精神：

其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劳和节俭是最古老的信条，它对商业经营同样是有益的，因此，中国商人普遍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有生命力的因素。

《朝奉郎挥金倡霸》写一个叫汪彦的商人，他“是个世代老实百姓的子孙。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余年，刻苦艰辛，也就积攒了数千两本钱。到了五旬前后，把家资打总盘算，不觉有了二十余万”。汪彦的成功来自于他的勤劳和俭朴，这也是所有商人都应具有的品质。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人与人以诚信相待，商人们出于对生意安全的考虑，也十分看重生意伙伴的诚实、守信用，将它看作是评价经商者品质的主要道德标准，同时商人们自己也注意在顾客和生意伙伴中树立诚实、守信用、忠厚的形象，以此来吸引顾客、竞争生意。《十二楼》之六《萃雅楼》写金仲雨、刘敏叔、权汝修三个朋友合伙开书铺、香铺、古董铺，“他做生意之法又与别个不同。虽然为着钱财，却处处存些雅道。收贩的时节有三不买，出脱的时节有三不卖。那三不买？低货不买，假货不买，来历不明之货不买。他说：‘这几桩生意都是雅事，若还收了低假之货，不但卖坏了名头，还使人退上门来，有多少没趣。至于来历不明之货，或是盗贼劫来，或是家人窃出，贪贱收了，所趁

之利不多，弄出官府口舌，不但折本，还把体面丧尽。麻绳套颈之事，岂是雅人清客所为？’所以把这三不买塞了忍气受辱之源。那三不卖？太贱不卖，太贵不卖，买主信不过不卖。‘货真价实’四个字，原是开店虚文，他竟当了实事做。所讲的数目，虽不是一口价，十分之内也只虚得一二分。莫说还到七分，他断然不肯，就有托熟的主顾，见他说这些，就还这些。他接到手内，也称出一二分还他，以见自家的信行。或有不曾交易过的，认货不确、疑真作假，就兑足了银子，他也不肯发货。说：‘将钱买疑惑，有甚么趣味？不如别家去看。’他立定这些规矩，始终不变。”这“三不买”、“三不卖”的生意规矩体现了做生意以诚信为本的精神，对顾客很有吸引力：“初开店的时节，也觉得生意寥寥。及至做到后来，三间铺面的人都挨挤不去。”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商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经营中讲仁义、讲公平、不贪不义之财，讲究买卖双方的等价互惠。《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挑担贩油，油坊里的人知道他是个老实好人，如今处境艰难，所以“有心扶持他，只拣窖清的上好净油与他，签子上又明让他些”。秦重为人忠厚，小小的贩油生意做得很有人情味，他“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与人，也放些宽，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节操，讲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许多中国商人继承了这一传统，鄙弃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恶习，凭自己诚实的劳动、正当的经营赚干净钱，过一种不屈己、不求人的生活，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生意人。《醉醒石》之四《秉松筠烈女流芳，图丽质痴儿受祸》写木商程翁为人正直有节操，女儿许配给了一寒儒之家。后来一徐姓大户“家里极富，真是田连阡陌，喜结交乡宦”，有钱又有势，看中了程翁之女。徐家先是许以厚礼，诱以富贵，后又求乡宦出

面保媒。程翁不为徐家富贵所动，不畏权势胁迫，不改初衷：“我不是卖女儿的”，“婚姻论财，禽行之道”。最后程家父女为了保一家之清白，不惜以命抗争。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有气节，讲操守的商人。

其五，扶困济贫、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也化为中华商贾的血肉和灵魂。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救助他人，在经营中讲究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狭路逢》写商人李天造贩桐油来到芜湖，在街上遇见一陌生老者被人冤为盗贼，百口莫辩，李天造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慷慨地代他付银息祸。《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临财不苟，拾金不昧，将拾得的六两二钱银子还给失主朱恩。后来施复去洞庭山购买桑叶遇到困难，朱恩知道后尽力相助，帮助施复度过了难关。在互帮互助中，两家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在中国商贾小说塑造的商贾群象中还有轻财好义的吕大郎^①，无私无欲的徐老仆^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商人相比较，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人。

中国商贾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扬还表现在它对由商品交换催发的恶德恶行的鞭挞和制约上。大家知道，商品交换在带给人们许多不同于传统的新观念的同时，也催发了人性中的许多恶。这种恶在商人生活中有比较大的市场。在对这些恶的鞭挞和制约中，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它的控制力、影响力，表现出了它的积极意义。具体说来，它一是惩戒贪婪：贪婪是商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恶。宋朝临安府商人沈一开着几个大酒坊和大酒店，一次神仙带着歌童舞女降临他开在城外的酒店，他“一点贪心忍不住，向前跪拜道：‘……小人市井小辈，别不指

① 见《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② 见《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

望，只求多赐些金银便了’”^①。神仙派黄巾力士到城中偷来一袋金银，对沈一说：“此一囊金银器皿，尽以赏汝。然须到家始看，此处不可泄露。”沈一喜不自禁，连连称谢，但又怕入城时被人发现，便用大锤隔袋敲击，使金银器皿敲实后不发出声响，这样安全过了城门，但到家打开一看，袋中原来尽是自家东西，已被自己锤得稀烂：“只因一念贪痴，妄想非分之得，故受神道侮弄如此，可见世上不是自家东西，不要欺心贪他的。”从神仙对贪婪商人沈一的侮弄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二是惩戒吝啬：吝啬也是许多商人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养成的一种恶习。富商张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②。有穷人来讨钱，主管出于怜悯，趁张富不在眼前，偷偷地施舍了两文。但这一切没有逃过张富这个吝啬鬼的眼睛，他冲出来，不但夺回自己主管施舍的两文，而且把讨钱人在别处讨来的钱都倒在自家的钱堆里，还叫手下把他揍了一顿。神偷宋四公路见不平，发个狠，晚上偷了这位“禁魂张”五万贯金珠。张富的故事从反面告诉人们：“钱如流水去还来，恤寡周贫莫吝财”，吝啬招损招祸。三是惩戒淫乱：贪淫好色而毁家丧命的商人古今中外为数不少，乔彦杰是他们的一个代表。^③他出外经商，贪恋女色，买回一美女春香回家做妾，引起家庭矛盾。春香不守妇道，趁乔彦杰出外经商之机，在家与街痞董小二勾搭成奸，引狼入室。董小二有恃无恐，进而诱奸乔彦杰闺中之女玉秀，引发一场人命官司，乔家三口死于狱中。乔彦杰回家目睹惨状，痛悔不已，也投河而死。中国商贾小说塑造这些好色亡身的商人形象，其劝诫用意是很明显

① 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楼盗物丧双生》“入话”。

② 见《喻世明言》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③ 见《警世通言》卷三十三《乔彦杰一妾破家》。